

論客家話的形成

張光宇

關於客家話的形成，近年有兩種學說頗引朵界注目。其一是羅杰瑞(1988)的“古南方漢語說”(Old Southern Chinese)，略謂現代的客家話是在公元一世紀到三世紀(東漢至三國時代)已存在於華南地區的古漢語的基礎上形成起來的方言。其二是魯國堯(1992)的“南朝通語說”，略謂永嘉亂起之後，由於北人南來使金陵成為南朝通語中心，客家人在長江中下游僑居時即操南朝通語，後來再度南遷才成為客家話。這兩種學說都以方言關係為立論基礎。羅杰瑞以閩客方言關係密切為張本，魯國堯聯繫客家話、贛語和江蘇通泰方言。客贛方言關係密切，自羅常培(1950)以來向無異議，魯國堯本此學說再事伸展，但在羅杰瑞看來，客贛關係相當膚淺(Superficial)；閩客方言關係密切，羅杰瑞首發其論並認為只有假定從早期南方古漢語的共同根源出發才足以解釋這一層關係。大約由於聯繫面向歧異，兩人所獲結論南轅北轍。方言的歷史就是人民的歷史，探討客家話的歷史，首先得了解客家先民遷移過程。

一、般北人避胡皆在南 南人至今能晉語

“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是唐代詩人張籍在<永嘉行>所詠的兩句話，鮮明生動地概括了西晉末年政治動盪下北人南移所造成的方言地理變化。這個政治動盪史稱“永嘉之亂”。

公元291年，由於司馬王朝內部爆發“八王之亂”，十六年間紛亂迭生，造成社會不安。北方的部族匈奴、鮮卑、氐、羌、羯見有機可乘，紛紛揭竿而起。公元304年，匈奴族劉淵在今山西離石舉兵，開啓了“五胡十六國”的序幕。公元311年6月，羯人石勒攻入晉都洛陽，俘晉懷帝。公元316年，劉曜攻陷長安，俘晉愍帝。西晉滅亡。公元317年，晉宗室琅琊王司馬睿在北方士族的擁戴下即位於建康，是為晉元帝。自此以後的273年間，中國以長江為界，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分裂局面。《晉書·王導傳》說：“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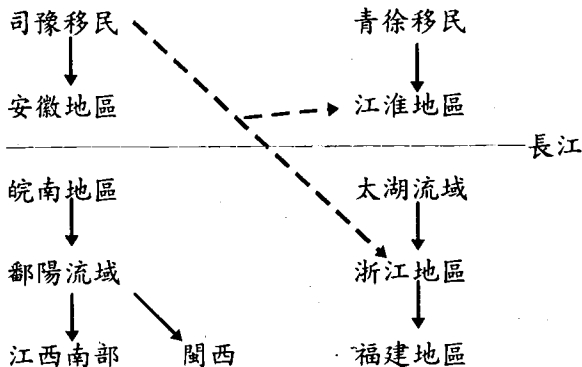
當時南逃的北方仕民大致可分三股：(羅香林1993：41)

一、秦雍流人 秦雍(即今陝西、山西一帶地方)等州的難民多走向荊州(即今湖北一帶)南徙，沿漢水流域，逐漸徙入今日湖南的洞庭湖流域，遠者且入於今日廣西的東部。

二、司豫流人 并、司、豫(山西、河南)的流人則多南集於今日安徽及河南、湖北、江西、江蘇一部分地方，其後又沿鄱陽湖流域及贛江而至今日贛南及閩邊諸地。

青徐流人 青、徐諸州(山東、江蘇北部)的流人則多集於今日江蘇南部，旋復沿太湖流域，徙於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

這三股移民把北方漢語方言帶到南方，對日後南方方言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其中與後世閩客方言的形成有關的移民略線可以簡括如下：



這個簡圖有主次之別，分別用實線、虛線表示。

如羅香林(1933:63)所說：“客家先民東晉以前的居地實北起并州上黨，西屆司州弘農，東達揚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豐。換言之，即汝水以東，潁水以西，淮水以北，北達黃河以至上黨，皆為客家先民的居地。上黨在今山西長治縣境，弘農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壽縣內境內，新蔡即今河南新蔡縣，安豐在今河南潢川（唐以前又稱光州，民國改今名）固始等縣附近。客家先民雖未必盡出於這些地方，然此實為他們基本住地。”從客家的堂號來看，客家先民也有秦雍和青徐的來源。例如梅州望族大姓當中，有王氏(太原堂，又三槐堂)、李氏(隴西堂)、溫氏(太原堂)、楊氏(關西堂)等屬秦雍背景，而謝氏(寶樹堂)、顏氏(魯國堂)、張氏(清河堂)、劉氏(彭城堂)、徐氏(東海堂)等屬於青徐背景。(張衛東1992:17)簡要說來，客家先民以司豫背景為大宗，青徐和秦雍背景為小宗。

司豫背景的移民當中有一部份徙入江淮(通泰)地區和太湖流域。譚其驥(1934)謂：“宋志：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南徐州今鎮江武進一帶)，實查則又有司州之廣平郡後省

為縣，豫州之南魯郡立魯縣，并隸南徐州。五方雜處，無遠勿至，蓋以此州為最。”陳寅恪(1963)說：“至南來北人之上層社會階級本為住居洛陽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團，在當時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晉之司馬氏皇室既舍舊日之首部洛陽，遷於江左之新都建業，則此與政治中心最有關係之集團自然隨司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導之流即此集團之人物，當時所謂‘過江名士者也’。當時南下移民多集結於江南太湖流域，一方面因為可以在東晉政權的庇護下得到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因為江南土壤肥美，易於營生。但是僑置郡縣不盡在江南，江北亦往往有之。《晉書·州郡志》“南徐州”序謂：“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欽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僑郡縣以司牧之。…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

在長安陷落以前，西晉宗室琅琊王司馬越早已派司馬睿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移鎮建鄴，做好南渡的準備。永嘉五年，司馬越病死於行軍途中。等到愍帝被俘，西晉傾覆，司馬睿就和過江世家大族建立了東晉政權。由於這一層關係，集結於太湖流域的北方世家大族有不少來自山東。《晉書·儒林·徐邈傳》上提到東莞始幕（今山東諸城縣西北）人徐澄之“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並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今江蘇鎮江市）。”這一批山東世家大族和洛陽來的士大夫集團共同維繫東晉政權，而就太湖流域移民的來源來說實以青徐為大宗，以司豫為小宗。青徐移民和司豫移民匯聚在太湖流域一起營生，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史實。

流寓太湖一帶北方仕民一則出於日常生活的需要，再則在宰輔王導的提倡下朝野形成“共重吳聲”的風氣。王導領頭學說吳語，事例見於《世說新語·排調》：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

“何乃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劉孝標的注說：“吳人以冷為淘”，直到今天吳語仍用“淘”表示冷，音“楚勁切”。陳寅恪以這則故事為例說道：“然則導何故用吳語接之？蓋東晉之初，基業未固，導欲籠絡江東之人心，作吳語者，乃其開濟政策之一端也。”相反地，當時的南方士人以說洛陽話為榮。事例之一見於《南齊書·張融傳》：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初為封溪令。……廣越嶂嶮，獠則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

其實，不僅張融能作洛生詠，一般南朝士族都能用洛陽話交談和讀書。(鮑明燁1988)這些事例表明，東晉時期由於北方仕民南下，太湖流域一帶進行了一場規模不小的方言交融。

太湖流域素為沃土膏壤，北方流人原可在此安居樂業。但其前提是不能損及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東晉政權是南北門閥支持下的產物，在這樣的政權性質下，江南“萬頃江湖”盡被世家豪族霸佔，“百性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匹，則不得放”。(《太平御覽》卷834引王胡之與庾安西箋)由於北方世家大族憑藉政治地位的優越而不斷強取豪奪，終於引發了南北世家大族的利益衝突，導致一部份北方仕民被迫再度遷徙。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鄉里、賓客、部曲，紛紛流寓到浙東會稽一帶，進而又發展到溫、台一帶，林、黃、陳、鄭四姓則移居福建。(王仲華1980:329)這是認識閩方言形成上一個具有關鍵性的歷史背景。流寓到太湖一帶的北方人來源雖然複雜，但其方言背景主要的是青徐(以山東為首)和司豫(以洛陽近旁為首)。這兩支移民共同習染吳語之後相攜南下奠定今日閩語的基礎。(張光宇1995)

二、古代和現代的方言關係

隨晉室南遷的士族從初履江南開始就觀察到南北方言的顯著差異。例如山西聞喜人郭璞在給《方言》、《爾雅》做注的時候，就常提“江東人呼某為某”一類的話。從南北朝開始，學者之間對南北方言差異的言談也逐漸多了起來。例如關心子女語音正訛的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就說：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陸德明在《經典釋文》敘錄說道：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重濁。

在南北對舉的傳統下，南方方言固然是混一言之，北方方言也不免籠統概括。其弊在遮掩事實真相，也給方言關係的探討帶來不利的影響。

事實上，北方漢語很早就呈方言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例如，古陽部所屬《切韻》庚韻開口三等字在公元一世紀的時候，京兆、扶風、鄒魯等大部分地區裏都已轉入漢時的耕部，而在汝南、南陽小部分地區裏仍留在陽部。（王顯 1984）西漢時期，歌支兩部在長江北面連著山東一帶合而不分，其他地方分別劃然。（虞萬里 1994）公元三世紀，山東任城（今曲阜）人呂靜《韻集》有兩個特色：一個是後來遭受顏之推非難的“益石”分韻，一個是後來為《切韻》承襲的“三四等”有別。假使我們暫時把細節（例如周祖謨指出：益石有別是魏晉時期詩文押韻的共通現象，不獨呂靜為然。）置於一旁，這四則漢語史現象大體反映：公元三四世紀以前中原偏東一帶的方言和中原偏西一帶的方言在發展上很不一致。為了便於稱述，我們姑且簡稱之為中原東部方言和中原西部方言。大致說來，中原東部方言比中原西部方言保守。

西晉末年的北人南遷，世家大族和所謂士大夫集團大約因

為掌握機先能夠做有計劃的退路準備，庶民大眾則在擊鼓動天，戎馬倥傯之際才倉皇逃難，尋求庇護。前者可以從容應對，跨越地理障礙而遠走高飛；後者限於舟車條件，只有就近避禍，輾轉遷徙，洛陽士大夫集團能在東晉政權底下成為“過江名士”，其他移民則多半沿海的歸向沿海，內路的多走內路，其故在此。這也說明寓居太湖流域的北方移民何以青徐多於司豫。在這樣的移民史背景下，從事方言關係的連繫就成為不但有意義而且興味盎然的工作。

舉個例來說，“油條”在廈門叫做“油炸(爍)糰”〔_ɕiu tsia² ʔkue〕，上海話(許寶華等1988)叫做“油炸燴”〔_hiö za₂ kue³〕，山東濰城、坊子、寒亭、安丘、昌樂、臨朐、青州、壽光叫做“油炸果”(錢曾怡等1992)，儘管“糰、燴、果”寫法不同⁽¹⁾，其實同出一源，可以視同《建州八音》注姿之對的“糰”(和果同一音韻地位)字。這種食品名稱多見於沿海一帶的方言而少見或甚至不曾一見於內陸的其他漢語方言。這樣的地理分佈絕非偶然，正是沿海移民在南下途中主走海路一線沿途撒播的例證。華南閩客方言比鄰而居，一在沿海，一靠內路。閩、客方言的區別大約反映古代中原東西的差異。例如在下列詞彙上閩客方言划然有別，絕不相涉：

詞彙	客家	閩南
香芳~	香	芳
鍋~子	鑊	鼎
採~花	摘	挽
修~屋	整(~屋)	修(~厝)

這些分居划然的單音詞使我們想到漢語史上“複音詞”化的由來，可能是不同方言的人民接觸之後的結果，因而有“芳香、鼎鑊、修整”等新面貌出現。閩、客方言保存的這一類單

音詞現象當是東晉以前長期行用於中原東西兩地的方言詞彙特色。

客家話與中原西部方言的關係，彰明較著的是“鼻”字。《廣韻》“鼻”字“毗至切”，去聲。北京音bi^ˊ（不送氣、陽平調）來自古代入聲（可作毗質切）。現代漢語方言當中“鼻”字讀毗至切的只有客家話（如梅縣pi^ˋ）、粵語（廣州pei^ˋ）和閩語（廈門pi^ˋ）；其他方言多從“毗質切”一讀，例如太原piə^ˋ₂，上海bu^ˋ₂還常有入聲尾印記，其他沒有入聲的方言鼻字也多半與全濁入的變化一致。《廣韻》為何不服從多數，從中“摭選精切”來為“鼻”字注音？反從少數論“南北是非”呢？從《切韻·序》中“吾輩數人定則定矣”和參與隋初陸家論難的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所謂“推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的話來看，鼻字注為“毗質切”大約是陸法言根據“多所決定”的蕭該、顏之推等人的意見取洛陽音為雅正的標準所定下的音切。客家話唸毗至切是先民南下時從司豫一帶方言攜下的結果。

“水”字音〔ɕfi〕在客家話地區的分佈很廣，例如台灣新竹六家莊（Yang 1967），廣東饒平（詹作慧 1933），福建建寧、詔安秀篆（李如龍·張雙慶 1922）和龍岩地區萬安、雙車、大池、永定、下洋、古田、上杭、武東、武平、湘店、軍家、涂坊、新泉、四堡、姑田。贛語地區的類似現象見於江西吉水、宜豐、修水、弋陽等地。華南漢語方言“水”字f-聲的現象在華南主要見於客贛方言而罕見於其他地區，極可能是司豫移民足跡所至所留下的殘跡。現代山西南部洪洞、萬榮、臨汾、吉縣、新絳、汾西、永濟、運城等地正是西晉司州轄境，水字照例均讀f-聲母。現代華北地區的同類現象雖然也散見於山東（單縣、滕縣、嶧縣、肥城）、甘肅（蘭州、武都sf-）和新疆吉木薩爾、青海西寧等地。但是論其來源，都不脫中原西部方言干係。

例如山東滕、嶧一帶的移民都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俞敏1989)

“母親”一詞在客家話地區有三種說法。一是“儂”，《廣韻》：“齊人呼母，莫兮切。”梅縣 $c m \varepsilon i$ ，新竹 $c m e$ 。這個說法是泛稱。二是“姐”，《說文》：“蜀謂母曰姐。”《集韻》注為“子野切。”寧都讀 $C t s i a$ ，新竹讀 $C t s i a$ 。這個說法見於“大婆細姐”(大老婆、小老婆)，“姐公、姐婆”(外公、外婆；母親那邊的阿公、阿婆)。第三個說法是“弄”，《集韻》：“于開切。婢也”翁源叫 $c o i$ ，新竹叫 $c o i$ 。其中“弄”可能有比較特殊的來歷(李如龍·張雙慶1992：498)暫且不論，其他兩種說法也都見於今天的山西南部。以洪洞方言為例，“母親”一詞就有“姐 $C t c i a$ ”和“默 $c m \varepsilon$ ”兩種說法和台灣海陸、四縣客家話如出一轍。

中國東南一隅從江蘇通泰地區(也就是《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所稱第三區)開始往西到安徽南部，然後從黃山南麓直下鄱陽湖流域，沿贛江而上到達贛南，或攀越武夷山到閩西，粵東。這一地帶的方言古全濁聲母今讀不分平仄皆為送氣清音，對吳閩方這呈包圍之勢。從西晉末年以來移民史路線看起來，幾可說凡司豫移民及其後世子孫足跡所到之處，都留下這個語音標幟。這種語音特點在華北集中見於古司州所屬的河東方言(也就是《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所稱南區方言)。例如“步 $ph-$ ，杜 $th-$ ，在 tsh ，淨 $tch-$ ，跪 $kh-$ ”在運城、芮城、永濟、平陸、臨猗、萬榮、河津、鄉寧、吉縣、侯馬、(沁水)、夏縣、聞喜、垣曲、稷山、新絳、臨汾、浮山、古縣、洪洞、襄汾、霍州、絳縣幾無例外。

由此可知，司豫移民從西晉末年逃離故土以前，古全濁聲母早已讀成送氣清音。若說司豫移民帶著古濁音(* $b-$ ，* $d-$ ，* $dz-$ ，* $g-$)南下，到了南方之後散居各地的子孫後代突然百花齊

放、產生相同的結果，那是不可思議的。

古全濁聲母今讀平仄皆為送氣清音在東南地區的分佈對吳、閩方言成包圍之勢，其實並不精確。被包圍的是吳語，閩語不在其中。多少年來，中外學者為了揭示閩語的神祕性質，長期努力找尋閩語中有別於其它漢語方言的突出標幟。黃典誠(1984)的“閩語的特徵”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其中一件作品。但論其實際意涵不過表彰閩方言內部的一致性。(比較李如龍·陳章太(1983)“論閩方言的一致性”)閩方言內部部的一致性“特點”其實也廣見於東南諸方言，還不足以突出閩語的特徵。也許出於對這種以“一致性”充代“特徵”作法的不滿，閩方言研究者間企圖另闢蹊徑，嘗試為閩語的定義找出一個比較精確的測試標準。這種嘗試的結晶之一就是羅杰瑞(1982)的“定母12字”：

th:啼、頭、糖、疊(沓)

t:啼、銅、弟、斷、袋、豆、脰、毒

假如某個方言，前四字讀送氣清音，後八字讀不送氣清音，個方言很可能就是閩語。這些個判別字得來匪易，誠可說是目光獨到，意蘊深遠。一般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如有文白兩讀，常見的文讀情況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閩方言的現象不然，白讀中不論平仄都有送氣和不送氣。更有趣的是在同一音韻條件下，一方讀送氣，一方讀不送氣。以廈門為例：鼻 pit₂, phi² | 堂 ctng, 塘 cthng | 投 ctau, 頭 cthau。這些同一音韻條件下的兩讀並行情況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其間的區別既不足以用文白加以概括，那麼現象由何而起呢？從移民史路線看來，這種現象當緣於方言融合。上文說過，凡司豫移民及其後世子孫足跡所到之處，都有古全濁不分平仄讀送氣音的現象。

閩方言先民中原有青徐和司豫兩個來源。兩方人馬匯聚在太湖流域習染吳語之後再度南下才成為後世所謂“閩語”。(張光宇1995)現代閩方言古全濁聲母讀不送氣的多於讀送氣的，正與閩方言先民以青徐為大宗，以司豫為小宗的背景相應。閩客方言的水乳交融關係在太湖流域時期已經展開，只是當時並無閩客之稱，但有青徐、司豫之別。換句話說，現代華南地區閩客方言比鄰而居(例如龍岩地區)所產生的互動關係是晚近的；南朝太湖流域一帶青徐方言和司豫方言的融合關係才是閩客關係密切的源起。

五胡崛起於西北，西晉覆滅以前，懷、愍二帝分別在洛陽、長安就逮。五胡十六國的禍害在中原西部猶為慘烈。烽火一起，鐵蹄呼嘯而至，兩京及其近旁的百姓首遭其殃，不得不大肆逃亡。南逃的司豫移民對後世漢語方言的發展是廣泛而深遠的。除了上文所論閩客關係之外，司豫移民還對通泰地區、皖南地區、江西地區以及贛閩邊界的方言產生鉅大的衝擊。

現代的吳語區大抵北以長江為界與江淮官話遙遙相望。但在東晉以前，吳語北界直抵淮河。(魯國堯1988, 1992)西晉末年，司豫移民遷入江淮地區以來，吳語在江北的勢力逐漸萎縮。通泰方言就是在吳語的底層上融入司豫方言色彩而逐漸變成今貌的。魯國堯以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和陰入調值低陽入調值高來連繫通泰方言和客家話。所論的然有據。問題就在有了這兩個共同點，通泰方言何以不能叫做“客家話”？我認為通泰方言之所以叫做通泰方言而不叫做客家話，一個最明顯的標記是咸山兩攝三四等讀為偏前偏高的元音(-ĩ / i²)。這個元音特色一方面可用以區別客家話，一方面可用以連繫閩南方言。通泰方言、閩南方言都曾和吳語有關係，因而也都具有這項語音特點。(張光宇1993)所謂通泰方言與客家話的關係，其實緣於“司豫移民”，也就是說同出於西晉末年的司豫方言。

皖南是西晉末年司豫移民南逃的首站，司豫移民在此駐足長達五、六百年，等到唐末亂事又起，其子孫又再度相率南遷，到達江西南部 and 閩西山區。今天的皖南方言情況複雜，有的方言(像銅陵、太平仙源)比較近似吳語，有的方言(像績溪)具有類似客贛方言共通的特點。這一帶地方古稱吳頭楚尾，在西晉末年以前應屬大吳語區的範圍，休寧方言(平田昌司1982)的“兒化”-n尾就是吳語的標記之一。(游汝杰1993:105)但是在司豫移民由此繼續南下之後，後世又繼續不斷有他地移入的新移民，帶來了河南、湖北的官話方言。直到今天，徽語有些什麼共性，一時還難以釐清。(李榮1989)不過司豫移民由此“路過”，有些人就在此落戶不隨人潮南流，這是可以肯定的。績溪方言古全濁聲母不分平仄今讀皆為送氣清音，實與早期司豫移民難脫關係。大約和通泰方言的情況一樣，績溪方言是第一期司豫移民所遺留下的語言。

客家話和贛語的關係密切，早期的漢語方言區別(李方桂1937,趙元任1949)(2)常把他們合稱為“客贛方言”。由於發現臨川話和梅縣話的大量相同點，羅常培(1958:2)於是根據客家遷徙的蹤跡試圖把客贛方言的關係定為“同系異派”，並認為至少有一部份江西方言是客家第二期遷徙所遺留下來的語言。羅常培連繫客贛關係的條例包括：全濁一律變次清，曉匣合口變[f-]，保存-m/p尾，蟹山兩攝殘餘一二等分立的痕跡，侯韻讀作[-εu]。這些條例說明，客贛方言的關係遠比客家話與皖南方言、通泰方言的關係還要密切。事實上，除了次濁上歸陰平調之外，客家話與贛語難分彼此。至於贛語，如袁家驊(1983:127)所說“沒有很突出的特點。”從司豫移民的路線看起來，客贛為“同系異派”殆無可疑，他們是在同一母體(司豫)方言背景下孕育出來的方言，他們的差別主要是異地而居以後的不同發展所致。這也說明何以“南昌話在詞彙方面似乎更

接近吳、湘、江淮方言，而與客家話並沒有特殊的親密關係。”
(袁家1983:127)

總起來說，客家話的關係方言不少。除了皖南一帶方言複雜，必須分別探討之外，其餘關係方言的來龍去脈相當清晰。

閩方言是司豫移民與青徐移民匯聚在太湖流域習染吳語之後再度南移才逐漸形成；通泰方言是司豫移民進入江淮地區，以吳語為底層，經由司豫方言與吳語的互動才逐漸形成今貌的；贛語的背景與客家話的背景原無二致，只因贛語吸納吳楚江淮方言的成分，才逐漸與客家話分道揚鑣。

從上述關係網絡來說，所謂“客家話”的關係方言主要源於“司豫移民”這一因素。“客家話”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後才出現的，也就是司豫移民遁入贛南和閩西等地之後才慢慢被標舉出來。所以，與其把上述方言叫做客家話關係方言，不如將它正名為司豫關係方言。客家話與上述方言同為司豫方言在南方所結的一個果實。

三 客家人與客家話

客家話之所以為客家話和客家人之所以為客家人是互為表裏的。中外語言學家長期測試的結果顯示：次濁上歸陰平在客家話內部呈現大面積的一致性，(橋本萬太郎)1973:440-441)是一個大體可區別於其他漢語方言的特徵。底下是李玉(1984:6)親自調查所得的結果，從中可以看出次濁上讀陰平(左邊數字)往往多於讀上聲(右邊數字)：

下洋 29,35	楊村 58,20	大鵬 42,15	涼水井 47,22
貴縣 70,30	中保 45,22	上猶 51,20	崇謙堂 36,25
尋鄔 28,5	長汀 49,23	連城 33,15	南康 30,9
四縣 30,21	陸川 25,14	高陂 36,12	海陸 15,12
上杭 34,16	清流 40,19		

黃雪貞(1988)認為以次濁上讀陰平作為客家話的定義還不周延，應該加上全濁上讀陰平才算完備。如此才能區別粵語台山話和贛語新淦方言。這是漢語方言區劃上的一個貢獻。但是從方言史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視線不必為分區的界劃所限。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通泰方言和江西新淦方言相距遙遠而同具古全濁上歸陰平的特色？為什麼安徽太平仙源方言和廣東台山同具古次濁上歸陰平的特色？是出於偶然共同創新？還是出於共同的歷史淵源？

持平地看，上述客家方言的聲調特點並無大張旗鼓的必要。閩南話漳州系方言和泉州系方言聲調的區別遠甚於客贛方言之間，例如漳州方言分陰陽去而不分陰陽上，泉州方言分陰陽上而不分陰陽去：(周長楫 1986)

	上		聲		去		聲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漳州	53	=	53		21	≠	22	
泉州	54	≠	22		31	=	31	

為什麼在這種分組態勢明顯的情況底下，方言分區工作者容許以其他共同點把兩個大方言合在“閩南方言”的屋簷底下，而非要想方設法利用轄字不多的聲調特點(如以次濁上歸陰平為限)把客家話從贛語分立出來？為了分可以無視其中的共同點，為了合可以無視其間的差異性。這種作法使得方言分合進退失據，實非平允立場。

由閩南漳泉兩系方言的異同回觀客贛方言的關係，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一般所謂客家話的特點不免誇大其辭。客家話之所以獨特，首先是緣於客家人的獨特歷史經驗。由於其獨特歷

史經驗，客家人長期遭受誤解。1957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歷史系合編《中國史學論文索引》把《粵西北部客方言》等文獻列入“少數民語文”類，就是這種誤解之下的產品。若問這種誤解從何而來？實在是因為客家人是華南半漢半畬的新興民系。關於這一點，羅香林(1933:74)早已指出：客家是自北南遷的民系，當其輾轉奔投的時候，自然免不了要受種種自然淘汰與選擇作用的規範，衰老的、弱小的不容易達到安全的境地，就是身體不很結實的女人也不容易與男子一同奔避。結果能夠到達目的地的，十之八九都是精力較優的丁壯。就中其有原日妻室能夠同時履止的，自然不必遽與土著通婚。但其他沒有原日妻室同時履止的，那就只好降格以娶土著婦女了。客家先民所以不能不與畬民混血的，大概就是這個緣故。這個說法合情合理，因為客家先民移入的閩、粵、贛交界地區至遲在公元七世紀初(隋唐之際)已為畬族人民聚居之所。但是，應該指出，客先民初履畬地，其身分為司豫移民後裔。我們今天所稱之客家人當起於漢畬通婚以後，也就是趙宋初年。“客家”得名之由即此土客關係，也就是以畬族立場對外來漢人的稱呼。(3)

自《客家研究導論》刊佈以來，羅香林的客家遷移運動五期說已大體學界所公認。(4)除了周振鶴·游汝杰(1986:22)認為應增“唐中期安史之亂後有許多北方人南下”一段之外，一般似無他議。從客家民系形成的背景來看五期的說法，從首至尾統冠以“客家”似有未妥。因為司豫移民非盡是今日所稱客家人。他的五期說可以分作兩節，前一節是司豫移民，包括一、二兩期；後一節是客家民系，源於第二期的司豫移民，至第三期已經定型。客家民系形成之後的遷徙才是真正的客家移民運動，這相當於羅香林的第四、五期。這樣區分便於說明所謂“客家”關係方言的關係。閩語、通泰方言、皖南方言、贛

語和“客家”話的關係是同具“司豫”背景；湖南、四川的客家話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後輾轉遷徙的結果（主要是元末、明末隨“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造成的）。（5）前者的關係是遠親，後者的關係如同手足

司豫移民進入閩、粵、贛交界地區之後對原住民畬族產生鉅大的沖擊。一部分畬族與漢族通婚形成後代的客家人，一部分畬族未與漢族混血仍保存其狗圖騰信仰作為其族群標幟。畬族“亦因須與客家盛營貿易的緣故，漸漸習染客家人的語言和文化，久而久之，遂把他們的語言都消失了。”（羅香林1933:75）因此，今天使用客家話人口實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漢畬混血的客家人所說的客家話，另一種是畬族人所說的客家話。這兩種客家話的使用人口都和畬族有關，外人不察，於是產生了令客家人大為激憤的誤解（例如以“蒼，犵”稱之）。客家人雖然身上流著有畬族的血液，但在他們的心目中仍自認為“華夏胄裔”，與信守狗圖騰的畬族大有區別。客家人的族群意識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勤修族譜且以中原郡望自矜。客家民居門眉出示堂號無非告訴外人祖上來歷，幸勿以他族視之。二是告誡子孫“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簡單明瞭地顯示“華夏胄裔”的身份。客家人以是否具有中原意識來區分客、畬；外人以是否帶有畬族血統去界定客家人，就是在這樣的夾縫中激發了客家人特別濃烈的族群意識。

了解了客家人族群意識的緣起，就不難洞悉為什麼比鄰而居的客贛方言明明大同小異卻非劃清此疆彼界不可。例如江西東部的黎川方言，（顏森1993）古全濁聲母平仄皆為送氣清音，例外的“渠”字（第三人稱代詞）讀不送氣音（*ctcie*），古全濁上讀陰平（如坐，下，在，近，動），“鼻”字讀去聲（*phi*²）都與梅縣一致，可是卻劃在贛語範圍。又如江西永豐南部的沙溪話明明具

有一些客家話的特點（如陰入低、陽入高，與南昌不同而與梅縣一致），但是當地人並不認為自己說的是客家話。“贛南信豐城和附近農村說官話，當地人很清楚哪兒哪兒的話的客家話，界線一直明確到具體的村子”。（顏森1986）這是很有趣的信息。我們要問：當地人是因客家人把次濁上讀為陰平才指認他們講客家話呢？還是知其為客家人才指認他們講的是客家話？

總而言之，客家話的起源是西晉末年的司豫方言，客家話是在司豫移民進入閩粵贛交界地區轉成客家人之後才作為族群標幟出現的名稱。轉成客家人以前仍應稱作司豫移民；轉成客家人之後的遷移運動才是貨真價實的客家移民運動，帶著濃烈的客家族群意識轉徙華南各地甚至遠赴海外。

從客家人的歷史經驗看來，所謂古南方漢語的假說實屬子虛烏有。(6) 閩客方言非無關係，但其關係發生在東晉太湖流域，司豫移民與青徐移民融為一體，然後南下成為閩語。換句話說，閩語中的“客家”成分得自司豫移民，並非原有什麼古南方漢語提供給閩客方言一些共同質素才使兩者搭上關係。事實上，閩方言的共同質素來自中原東西，謂之為“古北方漢語”猶為恰當。

客家話源於南朝通語的學說也滯礙難通。因為通泰方言和客贛方言之間的共同質素實由司豫移民這一共同方言背景造成，並非共同得自南朝通語的結果。南朝時期，江東士族以學說洛陽話為時尚，固屬事實，但其通行範圍只限於金陵及其近旁，論其來源也不脫司豫背景（洛陽及其近旁）。客家先民由北南遷，穿過皖南、江西直貫而下者多；繞到太湖流域再輾轉進入客家地區者少。事實上，入仕南朝的原司豫移民者的後代，在繼續南下的進程中多轉入福建成為今天閩方言人民的祖先。總括言之，今天的閩客方言同具司豫背景，但除此之外，閩方言還有青徐背景和太湖流域的方言經驗為客家話所缺如。

遷徙次序	遷徙時代	遷徙原因	遷徙起點	到達地點
第一次	由東晉至隋唐	匈奴族及其他外族入侵，對漢族大肆蹂躪，迫使漢族南遷避難。	并州司州豫州等地	遠者達江西中部，近者到達穎淮汝三水之間。
第二次	由唐末到宋	黃巢起義，為戰亂所迫。	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徽南部。	遠者遷循州、惠州、韶州，近者達福建寧化、州、上杭、永定，更近者到達江西中部和南部。
第三次	宋末到明初	蒙元南侵。	閩西、贛南	廣東東部和北部。
第四次	自康熙中到乾嘉之際	客家人口繁殖，而客地山多田少，逐步向外發展。	廣東東部北部，江西南部。	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台灣，有的進入廣東中部和西部。有的遷入湖南和廣西。
第五次	乾嘉以後	因土客械鬥，調解後地方當局協助一批客民向外遷徙。	粵中(如新興、恩平、台山、鶴山等地)。	近者到粵西(高、雷、欽、廉諸州)，遠者到達海南島(如崖縣、安定)。